

2514

大理州文史资料

第八辑



大理州文史资料

第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理白族自治州

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

一九九四年八月

目 录

李根源先生与永平文化建设	张焕明(1)
张冲与云南盐政	雷光汉遗稿(4)
朱家璧同志来到喜洲小学	黎 旭(8)
《平凡文丛》的文友	吴 棠(12)
顾建平与《滇西日报》	董述文(19)
抗日战争时期在印度兰姆伽成立七个 独立战车营的回忆	郭乃文(28)
我参加南洋华侨抗日先锋队回国抗日作战的 回忆	林志忠口述 王树邦整理(42)
回忆在缅甸参加抗日青年救亡社的情况	马淑真(44)
抗日勇士王正武的事迹和轶闻	杨学程(47)
回忆我的父亲盛家兴	盛世善(58)
回顾我十五年的解放军生活	冯国真(65)
忆普兆三同志二三事	普之宝等(90)
回忆四叔父李钟本	李克艰(96)
忆我的老师赵玉生	杨 铠(101)
略记民国时期滇西地区司法	杜文灿(106)
忆大理县下关解放前的基层行政机构 ...	马直卿(118)
民国时期大理凤仪两县的社会治安	向天明 洪向贤 赵文辉(121)
民国时期云南省人口调查统计及大理地区	

各县人口概况	赵锐明(148)
巍山禁烟禁毒简况	那泽远(159)
下关警察局长王静涵是怎样被逮捕的	李品伟遗稿(170)
下关玉龙社袍哥概况	马丽生(176)
从辛亥革命到解放前鹤庆的习俗改革	舒家骅 刘麟先(181)
剑川县沙溪乡教育史略	杨延福(185)
大理五台中学史略	李 公(195)
大理最早的一所高等院校	赵进国(198)
抗日战争时期的大理民族文化书院	李群庆(200)
忆中央大学“五·二〇”学运与吴有训老校 长的一个进步口号	陈华北(202)
回忆云南省第二届高中学生集中军事训练 的几件事	尹维宁(206)
大理州手工业发展概况(1956~1966) ...	杨国相(211)
大理地区昔日报刊发展概况	赵 铨(220)
大理地区解放前疫病流行概况	毛宗校 尚 敏(227)
剑川野鼠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发现史实 ...	赵永龄(240)
剑川石钟山石窟保护之沿革	张文渤(246)
下关旧城池述略	刘竹轩(253)
下关赵翰林府第记	马秀卿(258)
下关龙尾街“考核园”之名来由	马秀卿(260)
下关将军洞楹联抄	马秀卿(262)
对《马老六始末》一文个别史实的订正 ...	周 涛(269)

李根源先生与永平文化建设

张焕明

李根源，字印泉，又字养溪、雪生，自号曲石，别署高黎贡山人，云南省腾冲县（今划归梁河县）九保右安街人，1905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组织。1908年回到昆明，担任云南讲武堂总办，参加领导了云南“重九”起义，遂出任云南省军政总长兼参议会长。辛亥革命后，就任国民革命军云南陆军第二师师长兼节制迤西文武官员。1922年后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署过国务代总理，任过陕西省省长。1942年任云贵监察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李根源先生是辛亥革命元老和开国功臣，在全国享有较高的声誉。他也是朱德委员长的良师益友，倍受朱委员长的崇敬和爱戴。

李根源先生不仅在全国享有名望，而且在永平这样一个小小县份中也深受人民的敬仰和怀念。他注重典章掌故、风情民俗，每至永平城乡，无不躬自访求。他走遍永平山川秀景，关注地方文化的开发利用及名胜古迹的保护，对于优秀的文化遗产，更是百倍珍惜。

民国元年（1912年），李根源一行视察迤西，途经永平，为追念明末出任江南无为州知州并为国捐躯的永平老街人张化枢，飭县令李治改城内“魁星阁”为“张忠烈公祠”，并亲书“孤忠耿耿，大节堂堂。张忠烈公祠”门对横匾，遂于苏屯南茂街口亲自立石新建“张忠烈公故里碑”一座。李根源一行道经永平

境内的博南山时，漫步博南古道，登临永平名胜古迹“永国寺”、“金光寺”，考据永平历史，发思古之幽情。先生亲书“金光寺”匾额一方，悬于该寺大门之上，并与赵藩等人题名立石，竖起“博南山碑”，补书永国寺“昆、庐、宝、座”四块石匾中的“庐”、“宝”二字。“博南山碑”和“四字”石匾，至今成为研究永平地方文化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民国 31 年(1942 年)冬，永平杉阳镇绅杨自培等人，为谋求救济地方失学青年，爰倡议兴办中学，遂组建筹备委员会、校董会，以“古兰津渡”命名兴办学校为“私立兰津中学”。于时，李根源先生驻节大理，筹备委员会成员公推李先生为该校董事长，并派员前赴大理面报经过。先生欣然同意，并亲书校匾“兰津中学”交员携返杉阳。次年三月，兰津中学在杉阳性华寺正式建立，特聘李根源先生为名誉校长。兰津中学的建立，对于青年就学、培养地方人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民国 32 年(1943 年)春，永平县立初级中学成立，李根源先生特捐资购赠水田 22 亩，供该校永久使用。永平县立中学的建立，培养了大批人才，开创了永平教育工作的新局面。

同期，李根源先生多次巡查滇西，督导抗战。他曾在永平县城作抗战报告，慷慨激昂声讨日本侵略军占我领土，掠我财富、残杀骨肉同胞的罪状，激励永平民众支援前线，守土报国。在先生抗战救国精神的鼓舞下，永平大批青年壮士戎装上阵，奔赴前线，英勇战斗；男女老少踊跃投入挖公路，栽电杆，送军粮，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前方，为滇西抗战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由于永平人民支前工作较为显著，得到了中央交通部和云南省政府的多次传令嘉奖。

民国 32 年(1943 年)，滇西抗战中，第二预备师移师永平

整训，修筑“预备二师抗战阵亡将士纪念塔”，以奠忠魂。李根源先生亲自为该塔撰文、题词，缅怀抗战忠烈。同年，全国盛行修志，李根源先生特发信函于原云南讲武堂门生，时任永平县长李杰，引荐第二预备师师长顾葆玉聘任秘书、随军作战归来的前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江逢僧为永平县编修县志。江先生不负重托，不辞劳苦，历经艰辛，荏苒经年，主纂《永平县志稿》。此稿共十卷四册、二十二编（今存七卷三册，约五十万字，已经整理出版），上起永平东汉立县，下至抗战胜利，将永平一千八百七十多年的建置沿革、大事、典章、人物，以及工商、经济、农政、山川、名胜、风物、民俗等方面的历史风貌粲然略备，为永平历史文化之集成，是今天系统研究永平地方历史的唯一可考的志书。当志稿告成后，作为全稿鉴定人的李根源先生，全面细致地对志稿进行了研究，并撰写了近千字的首序，对志稿作了精辟地概述和高度的评价。事结之后，时值云南政局动荡不安，战事紧迫，无法托付出版，李先生便将《永平县志稿》转交云南省图书馆，并敦请妥善保存，至使永平珍贵的文化遗产得以幸存。李根源先生所撰《永平县志稿序》，不仅成为研究永平地方历史的重要材料，而且是研究云南地方史，特别是滇西抗战史的重要文献，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

张冲与云南盐政

雷光汉遗稿

张冲将军逝世已十年，人们为了追念他在生命历程的八十年里，曾为国为民做过不少有益的贡献，报章刊载的文章很多，大都颂扬他在军事、水利方面的功绩，惟对他在盐政方面的贡献尚觉阙如，故作补述，以尽彰其善行。

本世纪 20 年代，龙云主持滇政，废师为旅，以防兵变。101 师缩编为第九旅，张冲任旅长并兼任云南盐运使。张冲在 1930 年前后掌云南盐政数年，未将所积资财尽情享受，而是用以兴办一平浪移卤就煤工程，解决了云南盐荒。此一善举，功不可殁，凡今七十岁以上而当年曾处于贫苦的劳动滇民，感受颇深。

张冲在任云南盐运使期间，不是养尊处优，乐享富贵，而是深入民间，体察民情，立意解决云南盐荒问题。当时滇省的产盐情况是磨黑区的按板、香盐、益香、凤岗等盐矿的岩盐供过于求，沿途大山险阻，盗匪猖獗，瘴疫流行，又全靠马驮牛运，产得多，运不出。另一方面是元永、乔后、阿陋井等盛产卤盐的地方又因燃料不足，熬不出来，供需相悬太大。这一产卤地区，历来靠井场附近砍伐森林，用木材作为燃料，由于附近森林砍光，烧柴越采越远，运距成本越来越高，而且制盐锅灶仍是历史沿习的土法梅花灶，即五口铁锅共由一灶柴火熬煮，时间既长而产量又不大，再加以官商狼狈为奸，囤积居奇，一般穷民买不起盐巴吃，吃盐如同每月初二、十六打牙祭一样。

那时，各县的销盐情况是：全县每年销盐若干万斤，以一千斤或一万斤定为一张盐票。售盐商要出一笔款买这一张盐票，然后才得按这张盐票限定的数额另交盐价，到统销处购取盐巴在商店零售。零售价的高低，县长不闻不问，这就苦了吃不起高价盐的一般贫民。国民党县党部的书记长了解到县长的这一敛财手段之后，摆出要弹劾的架势，县长受吓不得不分给一部分盐票去让县党部书记长也饱私囊。张冲是了解这种情况的，但要清除这种积弊却无能力。他认为只有发展生产，供需问题才能解决。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决定亲自去元永、乔后等井场附近的地区寻找煤源，利用煤作燃料，再改进煎盐方法。

那时交通不便，踏勘寻找煤源全靠步行。经过多少个风餐露宿，终于在一平浪发现了蕴藏丰富的优质煤。一平浪当时只有几家少数民族居住，张冲把几家户主请来吃了顿饭，讲明要利用煤矿引卤煎盐的设想，得到他们的支持。后来经过反复踏勘引卤线路，才拟具初步设想，呈请省主席龙云批准兴办。龙云问了他需要多少经费，多少时间能够见效之后说：“我省府哪有那么多钱来搞这样大的工程啊！”他说：“只要主席批准，钱我已准备得有一部份。”龙云问：“你哪来的这多钱？”他答：“我这几年当盐运使的个人全部收入都存着未用，先拿来作开办经费，以后若不够时再请省府酌情支持拨款。”龙云说：“不先解决你的住房和将来的生活问题，来搞这样大的艰苦工程，你考虑好了吗？”他答：“只要能解决云南盐荒问题，我自己的生活到哪步说哪步的话。”

龙云经过一番思索之后，决定任命他为一平浪工程督办，以李炽昌为工程师，正式开始了设计施工。

在设计 and 施工过程中，张冲经常住在距一平浪十多华里的舍资街，与工程技术人员一道勘查，解决难题。其中最难办的是输卤管道的材料问题，要能抵抗卤水的侵蚀，金属管道不能用，采用竹管也不行，最后决定烧制瓦管。试烧过程中也屡受波折，试验多次，改进烧制技术，历时很久才得成功。

待制盐场初见成效大量产盐时，值抗战军兴，云南首先编成第六十军北上抗日，卢汉任军长，张冲任 184 师师长，一平浪交由财政厅长陆崇仁接办，陆又派刘幼堂专司其事。

我是在张冲的 101 师缩编成第九旅以后于 1933 年考入旅部任录事的，那次招考录事，名额是三名，却有三百多人报考。旅部驻在盐运使署的一个小院里，考场设在盐运使署的食堂里，一张四方八仙桌坐八名考生，如同聚餐入席一般。三科笔试之后又进行口试。最后发榜初选七名。此七名试卷全部专人送到舍资街由张冲亲阅，从中选录三名。那时的录事，不光是抄抄写写，一上办公桌就得从签办、拟稿，到缮写全套承担。我入部一年之久，才得见到张冲之面，其时他从舍资回到昆明，拟将盐场建设的一个阶段总结向省府陈述。我被张冲召去抄写，因抄誊万数字的文稿每次都无一字差错，字迹工楷为三个录事之冠，而被提升为书记长。到了 1938 年，他在抗战中以亲共罪名被撤掉新三军军长职，送回云南软禁之时，才成了他的私人秘书。

我在旅部任职期间，凡是有关一平浪制盐场要写要拟办的文件，张冲都要我去办。他虽然自谦读书不多，文笔不行，但我拟的文稿中有文字不当之处，经他一一细心指点，顿感高明得足为我师。他待部下随和，关心疾苦。1941 年我患了严重的伤寒症。他离开部队回昆明述职前，一再嘱咐军需处长，不管

用多少钱，一定要把我抢救回来，使我非常感激。1946年他奔赴延安后，我仍以家庭教师的名义在他昆明家中与他的家属共患难。直到1952年由我经手将他的翠湖东路住宅及家用器物等造册移交省人民委员会接收，他的家属搬进民委招待所之后，我才搬进云大宿舍，专在校长室秘书科工作。

张冲虽然在著名的鲁南台儿庄战役中名震中外，后来又策动旧日僚属起义，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过重要贡献，但他从不自傲，待人诚恳，和蔼可亲，吃苦耐劳，关心人民疾苦，生活上以勤俭为荣，艰苦为乐。1930至1941年他租住澄江籍在昆明的工程师罗紫台翠湖东路25的一所三间两平的一层旧式楼房，会客室兼餐厅里只有一张饭桌，几把旧藤椅。工兵总指挥马崇六将军来访后，都禁不住连声感叹道：“唉，就这点住房，哪里象一位将级军长住的，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

全国解放后，张冲的经历、学识、才干一直受到党中央的重视和全国人民的敬重。他不论是在云南任副省长和去中央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都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马列主义，密切联系群众，象他当年深入实地考察开发一平浪制盐场为人民造福那样，脚踏实地地抓水利电力资源的开发利用，为人民大众的利益鞠躬尽瘁。他逝世后，邓小平同志在追悼会上，对他带有传奇色彩的一生给予了公正和极高的评价。他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那样贪官污吏遍及全国的混浊时代，竟能舍己为民，兴办一平浪这样的艰苦工程，确是难能可贵，值得赞颂的，故作此补述，以供借鉴。

1991年元月十六日于祥云一中

朱家璧同志来到喜洲小学

黎 旭

1941年8月中旬，时任滇军第一旅二团三营营长的朱家璧同志，率领20多名连排军官和班长到大理师管区接新兵。那时我在喜洲小学教书。一天，收到赵汝訥由大理城带来的信，告诉我这个消息。我高兴地乘马车，到城里直奔他们住的地方——大川宫紧隔壁的马店。我对家璧同志说：喜洲风景很美，除我以外，还有他的两个集训队学生（1937年6月云南当局感到抗日战争已是大势所趋，为准备一批预备军事干部，调集全省高中二年级学生到昆受军事训练，我们是第二届，家璧同志时任我们六中队中队长，他利用一切机会向同学们进行革命思想的启发教育），我们热诚希望你能抽空到喜洲休息几天。家璧同志慨然应允了。

几天后，他带一个警卫员，牵着一匹高头大马，跨进了喜洲小学的大门。我把他安排在宿舍里，那是前院左边幽静的一个套间，外面是教职员饭堂。宿舍里只有杨济舟和我两人住（杨在大理中学与我同学，也是集训队学生），我们临时加了一张床，警卫员则安排在另外的地方，马就拴在院子里。我床上有一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墙上贴着一张拼音字（那时称拉丁化新文字）写的授课时间表。家璧同志扫视了这些，当然了解到他的学生当时的政治思想状况。于是，当我大胆地问他：“中队长离开集训队以后在什么地方？”他毫不隐讳地说：“我去延安念书嘛。”开饭的时候，他和校长老师们同坐一桌，

校长赵石生看到这位气度不凡，谈笑风声的营长很高兴。在旧社会，团、营长的社会地位是很高的。

第二天清晨，天刚麻麻亮，家璧同志就在看一本叫《夜未央》的书，我心里不由地产生敬仰之情。他是这样勤奋地学习呵！我联想到集训队的情况，别的中队上课只讲典（步兵操典）、范（筑城教范）、令（勤务令），他也讲这些，但寻找机会介绍我们看高尔基、屠格涅夫、鲁迅、巴金的著作，亲自讲解高尔基的《海燕》，鲁迅的《狂人日记》等，如果谁在星期天背不得《海燕》这篇散文诗，谁就休想放假出营。

这天，他到华中大学找到王孝伟和华纯（女），他们两人都是华大学生。王孝伟是祥云人，我省中共第一任省委书记王德三的侄子，1939年我们在昆明一个读书会上相识（王孝伟现在在北京，是新华总社离休干部，华纯则在贵阳园林局离休）。那天，我们一块去景色如画的沙村，杨济舟借了一条小船，大家登船自己撑篙，随意地顺着岸边划去，垂柳在微风中轻轻摇曳，蓝天，白云，海水清。家璧同志兴致特别高，似乎一下子变成年轻人，和华纯伸手在船边捞海草，一把把捞进船，他向华纯挑战：“来赛编发辫，看哪个快？”于是两人的手飞快地动作起来，不大一会都编好一长串，然后又抛进海中。不觉间，船驶到“海舌”，看到微波拍打着伸到海中心由螺、贝壳镶成的白色长堤，家璧同志高兴得跳上“海舌”，高喊：“诗人，画家！多多观察些！”其余的人或眺望海东景色，或拾贝壳，或引吭高歌。太阳快落山了，我们才尽兴返回学校。后来，家璧同志还不时向人谈起那次喜洲之游。至于他的学生，我和杨济舟则更是记忆犹新。

家璧在喜洲住了两三天，就返回大理城办理接兵的事。以

后我利用星期天再次进城和汝訥一起拜望他，碰巧遇到中秋节，他留我们参加部队过节。

晚饭前的空闲时间，我和赵请他谈谈对时局的看法。他谦逊地说：“我讲不好，还是请这位和你们谈。”他指指在旁边坐着戴眼镜穿军服的一位年轻人。当时谈的话语，现在已无法回忆，不过都是围绕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军事形势，进步力量与顽固派之间的较量和青年努力方向这个主题讲的。事后汝訥告诉我，谈话的是黄炎培先生的侄辈。

部队过节，既简朴又丰盛，没有桌子就在地上铺一层绿松毛，大家盘脚席地而坐，炊事员做出十多个菜，可没有人喝过量的酒，因为晚上还要开晚会。

旧社会的马店是非常简陋的，除马厩马槽外，人住的地方就是几间旧房，几张木板床。房屋都不大，没有可供三十多人活动的场所。晚会就在店子前的街心进行，没有任何布置。这是一条僻静的背街，只偶尔有个把行人，当月亮从东方升起时，以连排为单位围坐在石子路上。晚会正式开始前，大家合唱《义勇军进行曲》、《部队进行曲》（《八路军进行曲》改编，只改动几个字）、《团结就是力量》。家璧同志讲了几句开场白，他说：“今晚上是中秋节，人民都在家中过团圆节，我们革命军人要过有意义的团结节，怎样才叫有意义呢？我们来个歌咏比赛，以连、排为单位，也可以个人出场，看谁唱得好？由大家来评，唱得好的坐飞机，唱不好的骑乌龟。现在就开始吧！”一番话引得大家都笑了。我则觉得这样的话很新鲜，从革命报刊上我看到许多有关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的介绍，知道在革命竞赛中常用“飞机”、“乌龟”比喻进步的速度，想不到在古城大理也能听到这种激励进步的召唤，怎不叫人兴奋无比呢！

节目一个接着一个，几乎演唱了当时全部的抗战歌曲，有《黄河大合唱》里的《保卫黄河》、《黄河船夫曲》、《黄河怨》、《黄河对口曲》，有《古城颂》、《青年颂》、《游击队歌》、《我们战斗在太行山上》，以及陕北民歌等等，总共不下二三十首。可以看出这次演唱事前是有充分准备的，没有重复的曲子，而且进行得很有秩序，每唱完一曲，大家都报以热烈的掌声，互相鼓励。歌声嘹亮，雄壮、整齐，有军人的气势，我分不出谁好谁差。这不像一支国民党的旧军队，却很像后来的“边纵”部队。我这才深深认识到：革命的歌声对激发人的爱国思想、战斗激情是多么重要。

这已经是将近五十年的往事，当时大家都很年轻，现在都变为两鬓染霜的老头，有的已经辞世，可意想不到在春城一个偶然的会，我不仅回到家璧同志身边工作，而且和参加晚会的王子近同志，给我讲形势的肖获同志见了面。那是1982年和子近在一起时，他谈到1941年到大理接兵他也去了，中秋晚会他也在场。而且告诉我，和我们谈话，戴眼镜穿军衣的叫肖获，是西南联大学生。肖获曾在联大剧团演出《阿Q正传》中饰“小D”，此后大家都叫他“小D”，因此将原名施载宣改为肖获。肖获在《羊城晚报》编副刊（后为《人民日报》驻天津记者）。1986年初，肖获同志来昆，与我同住省委组织部招待所。到昆的当天，子近同志特意拉我和他见面，大家又一同重温了这段往事。

《平凡文丛》的文友

吴 棠

四十年代后期，一批大理籍的高中毕业生到省城昆明报考大学，分别在云南大学、五华文理学院、英语专科学校肄业。其中有几人在中学时代就喜爱文学，国文基础好，经常向昆明、重庆、桂林等地文艺杂志和报纸副刊投稿。到昆明又结识了当时活跃在文坛上的一批诗人、作家和青年作者，受到进步文艺思潮的熏陶，志同道合的就经常聚集在一起，相互切磋探讨文艺方面的问题，开展一些类似“文艺沙龙”的活动，主题就是“以文会友”。办刊物是大家的愿望和追求。

抗日战争时期昆明被称为“民主堡垒”，自从抗战胜利西南联合大学复员北平，昆明文坛趋于冷落，文艺刊物只剩下杨明、普梅夫、邱晓松编辑的《诗歌与散文》，常枫、夏阳、罗史等自办的诗刊《诗播种》。另外就是1948年筹建、1949年5月出版发行的《平凡文丛》。这份由杨秉武、吴棠、张文勋、朱宜初担任主编的文学丛刊，其中三人是大理州人，朱宜初为广东籍，身份均系在校学生。主编中的倡导者是杨秉武，出力最多的也是他。主编之外还有四位编辑委员：梁仲模、李鑫庆、施荣宗、赵步云，都是大理、洱源人。他们四位虽不多写文章，但热心于编务和经费的筹措及发行事务。

杨秉武，白族，大理东门外一家贫苦农民的儿子。由于家庭贫寒，弟兄多，他读中学时就入赘卫市口下一户做鞋子的白族手艺人家的为婿。他在大理县中、省中、五台中学完成初中到

高中学业，他爱人在大理女中攻读。秉武酷爱文学，高中阶段开始写作，向《中学生》杂志投稿，多数都被刊登，并得到主编叶圣陶先生的厚爱和指导。《中学生》是我国历史悠久、内容质量最高、切合中学生阅读，由开明书店出版的月刊，从三十年代起就被誉为青年的“良师益友”。当时的作者，很多后来都成了我国知名的作家、学者。由于有这层关系，《平凡文丛》得到叶圣陶先生的支持，并亲笔书写了刊名从重庆寄来。

秉武还向省外文艺刊物发表作品，结识了较多的青年作家。有个以南方作家为主的青年文艺刊物组织“平凡文艺社”，地点在南京，出有 32 开本文艺杂志。四十年代国民党政府的有关部门对进步文化控制很严，公开办刊物需要有个挂靠单位，杨秉武就用“平凡文艺社昆明分社”的名义作为“发行者”。经费是个大问题，是采用募捐的办法，主要向大理在昆明的同乡和学校的老师、同学募捐。“编后”记里说得清楚：“本来在去年九月，我们就筹备着出版了，因为大家都是一群口袋空空的‘穷光蛋’，心有余而力不足。七拼八凑的结果弄得几文钱，但不幸又遭受几次物价狂涨的打击，于是一直拖延到现在。在没有办法中，我们发动了一个募捐委员会，幸蒙各界人士踊跃捐助，本刊方得出版。这证明在今天大家还没忘记了‘文化’而且需要‘文化’”。有了经费还要找承印厂家，按当时政府有关部门的“规定”，没有经过“图书审查委员会”的登记、审查是不能印行的。笔者 1948 年下半年是一边在校读书，一边在昆明有影响的《复兴晚报》兼任记者，对新闻出版界比较熟悉，利用记者身份找到崇文印刷厂的经理，得到他的同意才由该厂印刷。出刊之后的发行，是委托光华街的几家书店和鼎兴街大光明电影院隔壁的一家书店代销。第一辑印了 1000 本，不到三个